

第六章 感恩戴德

帝封官在这里集合

我们一看高高的灰砖墙，及墙上架设的电网，心里便凉了半截，这回又完了，折腾了几个月还是监狱的客。想起辽宁公安厅看守所事务长找房子，心里不由嘀咕起来：谁说城市里的房子不好找，这回找到了。不戴镣就是优待。一件事还未见分晓，就下了一个最坏的结论。这是怎么促成的？我一想是长春监狱的经验促成的，也是我不相信共产党促成的，是我职业特务神经过敏促成的。

张处长下汽车走进一个办公大楼，门前没有牌子，只有一个卫兵站岗。一会儿出来一个干部，叫汽车开到南边一个灰大门。我们在门外下了汽车，进院从北门走进走廊。编排姜明文、郑明新、黄炳寰、李衍涛、张国泰、赵广元和我住一个屋。进屋一看，室内很干净，床上放着7个行李，上面蒙着白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看既简朴又漂亮。4个屋子，29个人住，非常宽敞。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战士的，他们原来在这儿住，现在把房子让给我们，他们的东西没有来得及搬走。我对大家说：“这是战士的行李，咱们不要坐，人

家一会儿要来搬的。”

大家谁也没敢碰，都坐在床板上。

值班的班长中等个，胖胖的，戴一个船型军帽，下士军衔，说话很和蔼，他说：“你们要洗脸就到那屋。”他往右边一指，我进去一看，里面有小澡堂子，还有洗脸池子，就是光线暗一些，房子太旧。

我对这位班长说：“屋内的行李什么时候搬走？”

我们整理完东西到走廊转了转，看到不少文娱用具，麻将、扑克、象棋……屋内还有书籍，这些书籍都是日文的。没有新书，没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可能另外还有图书室。

开饭专有一个屋子，第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饭后去洗澡，那一天是礼拜六，我们穿过几个小院子，到处是鲜花，五光十色，灿烂夺目，环境很幽美。我们经过几个改造机关都没有这样好的环境。洗澡回来，我向值班的班长报告：“可不可以唱戏？”这个班长说：“可以唱！”肖兆林私人有胡琴，拉了起来，我唱了两段，于泽霖也唱了两段。我感到这一天生活不坏，这里的环境很好。

上灯时，又换了一个班长，说话辽东庄河口音，他拿着纸烟问：“你们不吸烟吗？”

“我们没有烟，我们都想吸烟，我们有钱可以买。”

这位班长说着就走了，不一会拿了 15 条纸烟，告诉每人 5 盒，还有不吸烟的，剩了一些，又退回去了。我们把纸烟吸上了，那种高兴劲头真是难以形容，这 5 盒纸烟要比中午吃炖鸡，晚上吃包子都好。黄鹤说：“有了纸烟，我什么都不愁了，再多改造一个时期也没问题。”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了半天，这是什么地方呢？说是公安机关吧，班长穿着解放军的服装；说是解放军的机构吧，我们这些人应当归公安部门改造。看这种情形，这个机关不是新成立的。想想也好笑，来了一天又吃又喝，却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第三天 9 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个军官，上尉肩章，戴着近视眼镜，很白的脸，右手拿一个红日记本。他问我们吃饭了没有？生活

怎么样？一边走一边谈。大家要求写信，我是不想写信的，既然有人要求写信，我就可以利用这件事，知道这是什么机关。这位上尉说可以写信。

我便很自然地问：“回信寄到什么地方呢？”

“回信寄到‘抚顺市抚顺城市管理所’。”

我一听管理所？这是什么管理所？国民党有日侨管理所。来到这儿看到一些日本人看的书，难道真是日侨管理所？不对，我们这些人不能住到日侨管理所。又一想，既然是管理所，就要接受管理。也不错，不是监狱。这样好的生活环境叫什么名词关系不大，从这个名词上看这个机关不是永久性的，带有临时性质。管理所隶属于什么部门呢？也不知道。不过，我自信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就会知道的。

这位上尉把在沈阳担任组长的张禹斌、高青山、欧阳午^①、姜明文找去，指示了一些生活制度，叫他们四个继续担任组长。

我问张禹斌，这个上尉是什么人？张禹斌带着十分神秘的样子说：“不能问。”我心想，没有几天就能知道。看这位上尉的身体不像部队上的指挥员，一定是做政工搞内勤的，每天写东西，看东西，把眼睛都累近视了，身体也不怎么健壮，可能是指导员吧？

当天漫谈到这里的感觉，大家一致感谢政府对我们生活的照顾，至于有什么顾虑都没有谈，比如这个院墙上有电网，东南角上有岗楼，西南角上也有岗楼，岗楼上白天晚上站着手拿武器的战士。真是有点戒备森严，唯恐我们逃跑。再如，这里虽然吃得好，但是近期我们走不了，长期监押也不乐观。这些想法谁也没谈，只谈了一些正面认识，还有一些要求，如请求看电影等等。

正在漫谈的时候，一位年龄较大，穿古铜色制服的干部来到会场，进屋站了几分钟，问道：“谁叫陈旭东？”口气很严肃。

“我叫陈旭东。”陈旭东站起来又坐下。

“陈旭东，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试试吧！”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这位干部就走了。我认为这是给陈旭东一个警告，因为陈旭东在辽

宁公安厅看守所反省时，不断与看守班长、事务长要态度，不服管教。这次张处长把我们送到这里，那些问题一定随着材料带过来了。这里的负责人先给陈旭东来个“下马威”，叫他老实点。这几句话不算多，但分量还是相当重的。不知道陈旭东怎么体会？我认为这是辽宁公安厅对陈旭东的鉴定，由这里的负责人把它说出来了。我一想老老实实吧，别给我也来个警告，受不了。

上午阅读文件、报纸。吃完中饭，到院子打排球、打网球，一打就到下午4点，玩个痛快。这段时期，除了上午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玩，真正是吃得好，玩得好，没有几天身体就好起来，感到胖了。

于泽霖跟我学俄文，我在1950年于长春公安局学习过一年俄文，粗浅的知道一些，写有两本俄文抄本。经班长同意，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我教于泽霖一小时俄文。我也有个想法，我教他事先我也得好好准备，于泽霖这个人懂得不少，不能叫他不信任我这个老师，这也算是教学相长吧。再说，这也是需要。国民党时期学英文，伪满时期学日文，反动派依靠美国，不会英文爬不上去；日伪时期不会日文，在东北无法工作；现在呢，共产党一切都是以苏联的马首是瞻，如果不会几句俄文那多不时髦呵！居于这个想法我要把俄文温习一下。

一个下午，叫我们到医务室去检查身体。我体重117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全身没毛病，只有眼睛近视。眼科医生给我配镜子，我是近视170度。我说：“我的近视不严重，用不着配镜子。”这位医生（后来知道是外请的）说：“近视戴上镜子还好一些，不然越来越深。”我一听，配一副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配镜子。如果我自己安排生活，也不一定非要配镜子，这是政府的意思，心里感到这样照顾太费钱了。我联想到国民党时期，不用说对政治犯，就是陆军大学那样的高级军事学校，蒋介石最宠爱的学员，也没有给配过眼镜，其他机关更谈不到了。

在医务室的另一间屋里有一张镶牙的大靠椅。我高兴极了，我唯一的缺陷就是掉了几颗大牙，吃饭困难。这回如果能给我镶上

牙,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希望我认为不久就会实现。

我打网球,一打就是3个小时,别人换我不换。有一天,一把拍子不光滑,把我右手磨破了。打完球回来被当班的孙班长看见,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没有关系。不一会儿外面有人喊:“谁的手破了?”我跑出去一看,一位高个儿女护士端着药盘子在走廊站着。我走上前去,她把药盘子放在桌上,先给我把破皮那块儿洗干净,然后抹上红药水,又撒了一点药面,最后用药布包好,贴上橡皮膏,十分的耐心。临走还告诉我:“先不要沾水。”我感到真是不应该,手破了块皮,偏叫孙班长看见了,找来护士,又上药又包扎,真过意不去。肯定的说,我的孩子的手破了这么一小块,我绝不会领他到医院去治疗;我自己的手破了这么一点儿皮,也不会找人给我上药包扎;我幼年的时候手脚脸常破皮,我的父亲从不管这些事。现在破一块皮,政府却派来一个护士给我上药,自己那么大的罪恶真是受之有愧,我对大家说:“以后注意吧,什么事叫政府知道,就会给政府添麻烦,生活上的事不要再有要求了,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希望。”

快过国庆节的时候,我同高青山、张禹斌等人说:“我们应该组织个国庆节的小型晚会。”大家都同意。我编了一个相声,李树桂准备了三套魔术,大家又准备了几个歌子,到时候再讲几个故事或笑话。相声稿子拿上去,批准可以演。过了两天,崔科员来了,问我们要买什么乐器?我们开了一个单子:买一套锣鼓、一把京胡、二把二胡、一支唢呐。李衍涛说他会弹三弦,单子开走,以为不知哪天才能买得来,想不到不到两个小时东西就买来了!属三弦最贵,40元钱,交给李衍涛一弹,他不会。大家说把三弦退回去吧,崔科员说不用退了,留着以后用吧。大家认为李衍涛这个人成问题,他可能认为这些东西政府不一定能给买,随便多说一件也没关系,不成想,一会儿就买来了,这使李衍涛发窘了。也给他一个教育,他认为政府不能办的事,恰恰立刻就办了。有了锣鼓,每天晚上肖兆林领着李仲章、万厉、郑明新几个人练京剧锣鼓,晚上电灯一亮,锣鼓喧天,显得十分热闹。

在将近国庆节的一天晚上，看电影《马兰花开》。孙班长把故事的梗概交给我们，由刘荣第念给大家听。过去在监狱一年也看几次电影，到这儿还是第一次，大家都很高兴。

俱乐部里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中国人坐在进门的左首，日本人坐在中间，我们进去坐在右首。陈旭东说：“那个高个儿，戴近视眼镜的是溥仪，还有佟衡，他是汉奸！”

我们的脚步踟蹰了。我一看这是三个类型：日本帝国主义战犯，溥仪及其奴才封建主义的余孽，我们这 29 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这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帝、封、官，今天在这里集合。有意思！我想，就这屋里的人来说，过去一句话、一个手令，会使千万人的生命死亡，千万顷良田荒芜。过去都是大马金刀的太上皇，现在都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改造。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三大敌人的结果。我于是又想起在长春公安厅看守所时，一个政府干部对我说：“溥仪还要学习呢！”不错“溥仪还要学习”，还要加上一句：我与溥仪在一个管理所学习。人，这种活的动物真不可思议，我这个人怎么能与溥仪联系在一起呢？

看完电影，大家议论起这些汉奸。陈旭东认识的有，刘荣第认识的也有，张禹斌认识张焕相，我也认识一些汉奸，但没看清来看电影没有。比如我的中学校长韦焕章，我的三舅王庆璋，我盟兄弟臧锤的父亲臧式毅，我的亲戚张焕相等。这些人今天见着也不认识了，我那时才十几岁。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能认识我。

自找麻烦

一天，姜明文告诉我：“注意，说话得留神，有人很积极，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情况？”

我很不满意张禹斌。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我父亲的同事。1928

年他在东北航空军当过航空队的中校队长,我父亲是少校副官主任。后来因为吸鸦片,张焕相一到东北空军便把张禹斌开除了。以后不知怎么又参加了国民党,这回集中了才知道他原名叫张文焕,也不知在什么时间改成了张禹斌。到这以后我也发现他假积极。他所在的第4号正对着班长的办公桌,他每天当着班长的面,一定要做一些给班长看的工作。比如教万厉学文件,每天在走廊站队,报告班长;到院子又站队,又报告班长。这些繁琐的报告,用不着的手续实在麻烦。一共29个人,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报告多少次也是29个人。

因为张禹斌搞的这些麻烦,国庆节前我给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撤换张禹斌的组长,推荐李仲章当第四组的组长,并说站队、报告次数太多没有必要。这个报告写了5页,交给了班长。

一个下午,那个上尉来了,找我与刘荣第。见面之后,先问一些生活情况,接着叫我们写外调的证明材料。我还记得到这儿写的第一个材料是丁燕萍的材料,他是60军督察组的特务。由这开始写社会各机关索要的证明材料。

今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差不了几天,有人想在中秋节买一些吃的,政府指示,不用你们自己买,政府会按照人民的风俗进行准备。纸烟没有了,我在9月30日只剩下两支烟,判断下午可以发烟,可是我失望了,纸烟没发下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早饭后,上尉来了,今天他没穿军服,而是穿了一件灰色制服,一条米色的西服裤子,戴一顶便帽,他在走廊里说:“你们准备一下,一会儿去市里观礼!”

大家听到观礼鼓起掌来。每个人都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从长春来的穿蓝布制服,从沈阳来的穿黑布制服。在门口又遇到了在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些人,他们坐两部汽车,我们坐一部汽车,一起开往抚顺市车站。车站广场有临时的观礼台,我们被安排在观礼台的左首,那里事先摆了不少椅子,我们被引到座位坐下。不一会儿大会开始,主席讲过话开始游行。抚顺是一个煤矿都市,想不到也这么

热闹，在游行队伍中有这么多矿区，这么多学校，这么多的机关以及无数的工人和居民，真了不起！过去千金寨的痕迹找不到了，抚顺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天天在变，我从内心感到共产党有办法，不佩服是顽固蛋，那是不正视事实。

参观回来吃饺子，又发了苹果和月饼，但是没发纸烟，大多数吸烟的人感到什么都好，就是少一件东西，心中很空虚。

有人说：“早知道只发5盒烟我就不吸了，把烟瘾勾上来，又不发了，唉，不发不发吧。”

这是怎么回事？政府许多钱都花了，还在乎这几盒烟钱？这其中必有原因，恐怕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防火问题，这个问题在人员集中的地方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无所谓的小事，可是反映在我们身上却成了重要事项。吸烟就是一个例子，黄鹤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烟头，卷上纸抽了起来，这个烟头也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你一口，我一口，感到别有滋味儿。

晚上举行晚会，我与李树桂说了一段相声，又与他变了几出戏法，接着大家讲笑话，我表演了“学女人说话”。

节后的一个上午，崔科员把我们叫到图书室，人到齐了，崔科员对我们说：“等一会儿吕科长给你们讲话。”

就是那个上尉，他就是吕科长。我们鼓了一阵掌，他讲话了，真想不到是批评我！他说：“你们来了这些日子，许多人能遵守纪律，努力学习，但是有人不怎么好，竟想替政府执政！要换这个组长，要换那个组长；对站队也抵触，站一站队又妨碍你们什么了？这样的人太不自量，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我一听是我反映的情况，是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到头来说我太不自量。好了，以后一言不发。

开完会叫大家检查这些日子遵守生活制度的情况，郭树人站起来说：“我们2号房子，早晨倒尿桶没人去，我提议抓阄儿，谁抓着阄儿谁就倒尿桶，这种做法是劳动态度不好的表现……”我一听几乎笑出声来，低着头憋回去了。怎么想到用这个办法？他们那一

屋子的人都成问题，特别是段克文与陈燕茂，他们都经过了劳动改造，这么一点活就要抓阄，太不对了。

以后又分组检讨生活问题。我没有在小组会上谈自己的问题，而是背地问吕科长：“报告科长，我那个问题写一份检讨书吧？”

吕科长说：“你看吧，写一份也可以。”

我写了一份检讨书，检讨对政府规定的生活制度不满，归结到不认罪上面。

大家背地说：“谁要替政府执政？又要换这个换那个的，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胡说八道，牛肉吃多了，撑的。”

我也跟着说：“真是无聊，也不照照镜子，自己干嘛吃的都忘了，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

自己一想，到这以后我先挨顿批评，材料口袋里先装了一份检讨，带了这个头儿心中不好受，先人为主，第一个便是坏印象，人家是长时期不会忘记的。

1942 年在西安军统局的“西安查干班”受训，一个大队长对我们讲“切记，不为天下先”，这句话当时我认为不对，可是现在我认为对了。由此可以得出教训，少说为妙，不说更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受了批评以后精神不愉快。有一天，孙班长拿了一个小纸条子，叫我与刘荣第换地方。29 个人只对调我们二人。刘荣第在这表现得不错，调动不会有什想法，我呢，犯了错误调动，心中十分抵触。调吧，不调是不行的，什么原因也问不得。从 3 号搬到 4 号，这号的组长是张禹诚，正是我建议换的组长，我想这一定是吕科长的布置：关梦龄你不是反对张禹诚吗？好，这回就把你调到他那个组！看看你还反对不？反对一个组长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今后我一定要小心克制。这件事还在发展，不能再犯错误。我有了戒心，谨言慎行，感到在这里有了压力，精神上不舒展了。

这里的伙食比长春、沈阳都好，这里什么都能吃到，包子、饺子、面条、米饭……随便吃，吃得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认为政

府这样照顾我们，是因为我们过去“官大”，不然为什么这样呢？存在这种思想的有陈旭东。高青山写墙报不指名批评了陈旭东等人，我替高青山抄的墙报稿子。我认为陈旭东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共产党人道主义的具体反映，有了这些物质基础，才能谈到加速改造。说因为我们“官大”才吃好的，这实在是肤浅得很，也很庸俗。

我们 29 人都有急躁出监的想法，来到这里以后，这种想法并没有彻底清除。可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能否出监就成了疑问。我认为匈牙利事件使我们出监的想法落空。在匈牙利问题上背后虽有谈论，也怕给反映上去，所以，说话时也是造句修辞，特别小心。这时的思想是混乱的，加之到抚顺不久还不知道如何发落，每个人都各怀心腹事。

11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班长叫我们把条凳摆在走廊，又摆了两张桌子。这样一摆，大家知道要开会，开什么会呢？我们都没有经验，无法猜测。过了半点钟，吕科长与崔科员陪着一个少校来了，他微高的个，戴着眼镜，风度很大方。他一进来，我们都站起来了，吕科长叫我们坐下。这位少校看了一看我们，没有说什么。吕科长说：“现在开个漫谈会，每个人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不要有什么顾虑……”

接着这位少校说道：“我们要听听你们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可以大胆地谈……”

启发我们暴露思想，特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我谈不谈呢？谈出来是不是又要麻烦？这可要考虑一下，不能冒失，看看风头再说。这时有人举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谁我忘记了，谈得文不对题。我看，不发言，不暴露思想，都是不对的。我举手发言，吕科长准许我发言。我起来干脆地说出：“匈牙利事件发生，苏联派去了军队，如果美帝也派去侵略军，事态就要扩大，第三次大战可能爆发，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这么一来，我们自由的可能完全没有了。这是我的错误想法，国际紧张，共产党不会释放我们。”

接着有一些人也发了言，真正大胆的，如实的暴露思想的为数

不多，最后张禹斌发言，这已经是下午 3 点钟了，张禹斌在我的右边，戴上花镜，拿起笔记本，一边说话一边左右走，仿佛在学校里讲课一样，他讲的话使我忍不住笑起来，“而且……但是……不能不这样认识，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帝想要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加一个楔子，什么叫楔子呢？就是一块木头劈一个口子，往这个口子里再加一块木头，这就叫楔子。因此我认为，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现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有反对的必要……”他讲到了哲学、道学……我心里明白，他不是给我们讲，他是给吕科长及这位少校讲呢，是卖弄自己的“学问渊博”，他讲到快 5 点了才讲完，他完全没有理会吕科长及这位少校几次看表的情况，我们听烦了，感到讨厌了。他讲完之后，吕科长说：“张禹斌讲了一个多钟头。”别的话没有说，这个会就散了。

我心想，如果与张禹斌有仇，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在现在的环境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复，他真是愚蠢。

孙所长^②召集学习组长去开会，了解一下思想，谈到吸烟的问题，孙所长对学习组长说：“你们已经多年不吸烟了，你们来的那天，他们没有报告我就给你们发了烟，后来我知道了，认为你们既然不吸了，对身体有好处，就不必再发烟了。这不是政府舍不得几盒烟钱，是为你们的健康着想，你们就不必再吸了。”学习组长回来一传达，我同意孙所长的意见。吸烟每天早上要咳很多痰，强迫不吸烟也好，最好都不吸，但是有忍不住的，黄鹤与段克文到七所日本战犯的垃圾堆去拣烟头，回来偷着吸，在厕所吸，大家一反映，于是一天上午把我们 29 个人召集到图书室，专门谈吸烟问题，问谁还要吸烟？一举手有十多个人，我一想他们吸，我不吸也忍不住，我也把手举起来了，一共有 18 个人。吕科长一看，说道：“既然你们都戒不了，政府再发给你们烟。”这样，又吸上烟。不过这次发的是烟末，还发了一些卷烟纸，无论什么烟，总是解决了问题，于是我又吸上了烟。政府明知吸烟对我们身体有害，可是不发我们不高兴，也只好发给我们。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迁就我们，主要是有利于我们

改造,我认为离开改造我们的主题,管理所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12月4日上午,集合到大俱乐部。有我们29人,有汉奸56人,张焕相年龄比较大,内中还有30多岁的汉奸。1945年“九·三”胜利,才20几岁,在伪满做什么官呢?伪满的官也讲出身、年资,不能乱来。这些小汉奸过去与溥仪一朝为官,现在又在一起改造,可谓全始全终。

我想看看有没有熟人,看不清。这时吕科长同前天那个少校,陪着那位年龄较大的干部来到大俱乐部,少校说:“今天由孙所长给你们做报告。”

他是孙所长,就是来所不久警告陈旭东的那个干部!孙所长上了讲台,大家鼓掌。他手中拿着讲话底稿,先讲目前形势,后讲学习问题,最后讲日本战犯改造的情况。讲话中谈到苏波问题、匈牙利事件……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台湾和平解放很有可能……”并且批判了国际局势紧张就不能释放的想法,又说:“只要你们改造好,我们可以呈报有关机关把你们开释。”这些话我都记住了,他还透露了:“韦焕章顽固,要帮助他,但是有病也要给他治,张景惠也没有放,反动派的报纸造谣说张景惠被处死了,这些都是谣言……”

孙所长又说:“我的脾气不好,有时性子急……”我认为孙所长的确性子急,在对待陈旭东的那个问题上看得出来。

最后他说:“我希望你们早日改造好,我不愿意总给你们当校长!”

这番话使我们听起来非常入耳,既有希望也有勉励。他讲话的时候,有时照稿子念,有时脱稿子说,举些例子也很生动,讲到下午4时还没讲完,叫我们回来,明天再讲。

第二天,12月5日上午,又集合到俱乐部,先由吕科长介绍:“今天孙所长有事,由金科长接着做报告。”

这位少校就是金科长^③,他接着昨天孙所长的讲话,今天讲的是日本战犯改造的情况。

日本战犯集中到这里，开始每天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后来，他们不但不呼“天皇万岁”，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经过 180 度的转变，憎恨日本军国主义。他们交待了在中国土地上所犯的一切罪行。参观中见着中国的老大娘、老大爷，跪下痛哭，控诉自己，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中国人事情。他们认为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是毛主席派来的最好的工作人员。有一次，在院中打球，一个战犯把窗户玻璃打碎了，这个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问这个人伤没伤着？是不是有思想负担，精神溜号了？加以安慰。这个战犯很受感动，他说：“如果在日本，遇见这种事，一定要把打碎玻璃的人打一顿，是绝不会予以安慰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这里的工作水平。

金科长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对日本战犯的转变感到不容易，我认为，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从小就受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对日本天皇的崇拜无以复加，改造他们的工作既艰巨，又细微，不简单哪。同时又想，这样一来我们最近绝对出不去了。

李寓春有肺病，吃流食，每天早晨喝牛奶，吃饼干。一天早上他在饭厅喝牛奶，他要我吃了几块饼干，我边吃边说：“在家也难吃上这样的早点，政府太照顾咱们了，如果把咱们惯坏了，出去看什么也不如这好，那就麻烦了。”

“我已经向班长报告了，我不用吃流食，这里的主副食都很好，营养已经够了。”

“不要拒绝，医生有一定的标准，只要对你身体好，改造好，政府是不计较这几个钱的，我们只感激还不够，还要变成行动呀。”

“没有问题，虽然我有肺病，政府什么号召我都响应，绝不落后。”

李寓春表示得很坚决，接着又说：“所长这个报告，我听得明明白白，改造不好，什么也谈不到，现在就是要安心改造。”

看来所长的报告在我们中间发生了作用，侥幸出监当政协委员的想法都抛到垃圾箱里了。

像在朋友家中做客

12月7日,发现了一个新情况,那间大玻璃窗户的屋子,骤然搬进来许多人,每天我们倒尿桶都倒在南墙根的下水道,看到那屋子是空的,可是今天来人了!大家议论开来,得不到一个答案。

12月8日早饭后,政府宣布刘荣第为生活大组长,高青山协助,叫我们往4所搬家。这回把我调到姜明文这一组。孙班长念名次,我们这屋有姜明文、李衍涛、赵广元、张国泰、黄炳寰、杨文泉、王光复、刘荣第和我。我把东西搬到4所71号,最北边把门。在4所看到许多穿蓝棉袄的人,是哪来的?不是汉奸,有人认识,也是我们这样的反动派。

在我们对门70号,有欧阳午、张禹斌等人,他们两个都是原来的生活组长,新组只能有一个继续担任生活组长,他们问孙班长怎么办?孙班长指示:“你们选举吧。”这屋子有段克文、万厉、陈燕茂、郑明新、王建民、黄鹤、张大光、张禹斌和欧阳午,选举结果,赞成张禹斌的是4票,赞成欧阳午的是3票,票数一发表,大家认为生活组长的问题已盖棺定论。

欧阳午,大家与他开玩笑叫他“欧阳牛”,我叫他“小牛”,因为我长得矮,他叫我“小崽子”。票数一发表,欧阳午失望了,当时大家认为欧阳午改造的不如张禹斌。如段克文就反对欧阳午,认为欧阳午在生活上好嘀咕。欧阳午没当上生活组长,段克文等人非常高兴。这时欧阳午找我说:“咱们改造的不好,人家反对,我当生活组长也不行,态度不好。”

“小牛啊,你的生活组长我负责,我保险。别说还有3票赞成,就是一票赞成你也换不下来,这若是旧社会,我给你活动一下,你就得请客,今天不开玩笑,70室生活组长一定是你欧阳午。”

“孙班长叫选举嘛，选举出来还能变化？”

“什么选举？没有人民立场的选举，没有是非的选举，不算！这是政府对你们这些人的一个考试，结果 4 个人不及格，张禹斌的生活组长是他自己撤掉了，不是别人撤的。”

“怎么回事？”

“在 11 月底那个暴露思想的会上，有金科长和吕科长在场主持，张禹斌做了一点多钟的总结性报告，这就决定了今天的生活组长不是他，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快吃晚饭的时候，刘荣第把 70 室选举的情形，经过，报告了孙班长，晚饭后，孙班长到 70 室门口宣布：“这屋的生活组长由欧阳午担任！”

事后，欧阳午对我说：“小崽子，你真行啊！”

“不是我行，是你们那屋的人看不出来问题。”

搬到 4 所之后，我们这 29 个人，占了 6 个房子，3 个房子住人，一个房子食堂，两个房子搞文娱，洗漱室没有了，不如一所宽绰了。

那些穿蓝棉袄的人是从南京来的，有一百多人。他们有很多错误思想，有人认为到东北是下关东，地方苦，天气冷，到东北等于逃荒；一进大门看到院墙，电网和岗楼，认为是住进了牢狱，长期羁押，再也不能回关内了……千奇百怪的想法，在小组会上，在背地里传播着。他们的思想在浮动，不知到这里是怎么回事。

过了九天，武汉又来了一批人，有八九十人，这批人住在 3 所，他们的包裹很多，还有许多捆行李的绳子。孙班长叫我们去几个人把他们这些东西搬到仓库。在搬东西时，我发现每个包袱都有名字，我仔细的看看有没有熟人，便看到了“陈烈新”的名字，我回头告诉陈旭东：“烈新也来了（陈旭东有个叔伯弟弟叫陈烈新，在长春团管区当副司令），在 3 所呢，他怎么到了南方？真想不到。”

“我没看见烈新，我看见鲍志鸿和黄康永了，一定还有熟人。”

武汉来的人在院中谈话，有人说：“这个地方好冷呀，受不了，

改造是越来越苦，生活制度越来越紧。”

不几天又从北京来了一批人，有30人左右。这么一来，3、4所^④共有二百多人。这个老熟人，那个旧同事，猜测这个，判断那个，讲起来思想又波动了。

我认为把这些反动派都集合到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既有改造经验，又有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改造，这是好的一方面；不好的方面是最近别想走。

这些日子吕科长不到我们这里来了，天天呆在南京来的人那里，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我心想，二百来人，做管教工作的可要操心啊。这使我想起前几天崔科员找我谈话：“王庆璋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三舅。”

“你知道王庆璋的家属在哪儿？”

“不知道。”

我感到愕然，政府怎么知道我认识王庆璋呢？王庆璋不可能认识我呀。

崔科员接着说：“政府要给你三舅找家属，不知道他家属到哪去了，你可以提供一下线索吗？”

“我只知道他在‘九·一八’事变时，住在沈阳大东关二署南胡同。在长春我到过他的住址，但没见到人。刘荣第认识我的表弟，王庆璋的儿子与他是朋友，回来叫刘荣第提供一些材料吧。”

政府给汉奸代找亲属，这样可以使他们减少家庭负担，好好改造。哎哟，这真是用心良苦。

回想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戴笠在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把汉奸逮捕，派特务和警察在汉奸家中驻守。有的把汉奸的小老婆给奸污了，有的把汉奸的女儿强奸了，今天到汉奸家中拉沙发，明天到汉奸家中“借”车子，我就派了许多小特务到汉奸家中去“借东西”，给戴笠布置客厅。汉奸被押，对其家属设法敲诈。汉奸一人犯罪，全家跟着受辱，这些情况我是耳闻目睹说不完的。看看共产党对汉奸的家属、我们的家属的照顾，我感到十分惭愧。做管

教工作不容易，在理论上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服我们；在态度上要有托儿所阿姨的耐心，才能使我们感到温暖；在待人接物上要有平易近人的作风，才能不使我们害怕，敢于暴露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管教人员的言行表达出来的。作为我们要从管教人员那里吸取党对我们改造的精神食粮，依据管教人员的言行，作为将来重作新人的榜样。管教人员代表着党，代表着政府对我们实施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改造政策。改造工作相当光荣，但也是非常艰巨的。12月中旬我们便停止了学习，准备文娱节目在新年演出。我是这29个人选出来负责文娱的，我们准备了一个话剧《向真理低头》，还有相声、双簧、快板、京剧清唱、魔术、二人转等，每天都在排练，心里不想更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几个人打扫院子，在一所的窗户下边，我发现了一只被黄鼠狼咬死的老母鸡。这只鸡挺肥，还可以吃。从这件小事，我知道我们的生活相当好，每次吃鸡肉，每人一碗，全所吃一次鸡要有几百只，所以丢一只两只无所谓，如果小人家丢了一只鸡那还得了。因为吃得好，我不馋了。

每天晚上屋里放来暖气，外边飘着鹅毛大雪，零下20多度的气候，我们在屋里穿不住棉袄，真是室暖如春。拿着纸烟，喝着开水，想想过去那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摇摇头心内不安。

1950年，《人民日报》刊载一篇阎慰冰追悼她父亲阎朴的文章。她父亲是共产党员，在革命根据地作过经济部长，长期革命积劳成疾，1950年在北京医院病死。她追述阎朴的艰苦革命精神，真是令人感动，文章里的主要感人之处是：

“作为我的同志、我的老师、我的父亲，你在人民需要你的时候死去了，我为失去了一个好同志而感到难过。

“在长征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乘马给有病的同志乘用，组织上照顾他多病的身体，发给他的物资和钱，他转给别的同志，他关心别人，胜似关心自己。他看到别的同志有病着急，但是他忘了自己也有病。

“我父亲出身一个地主家庭，是三少爷。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每年放暑假回家的时候，一些贫苦的老乡都来找我父亲，他们都是含着眼泪来，带着笑脸回去。我父亲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有一次被匪保卫团追捕，我父亲躲到山上一个洞里，一个好心的老奶奶给我父亲送来鸡蛋和一些上供用的供品，老奶奶说：‘三少爷！你有肉吃，有绸子穿，你为什么要这样担惊受怕干这些事？’父亲说：‘老奶奶，我不是为我一个人吃肉，穿绸子，我是为全国劳苦大众都穿上绸子，吃上肉。’老奶奶听了，点点头说，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人！”

“1950年在北京医院卧病的时候，组织上照顾给雇用了特别护士，父亲拒绝了。父亲问我住这样的医院，一天要多少斤小米，今年年成好不好。在病床上，他强烈地希望回到江南，看看那个老奶奶还在不在？看看江南的劳苦大众翻身后的生。父亲没有看到这些，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江南上空飘扬，就与我们永别了……”

这篇文章，我常常回忆起来，使我对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十分敬佩。

过新年的前夕，发给我们一些苹果、糖块。我们的文娱演出博得了全所好评。我与段克文说的相声是我编的，内容是批判教条主义，名为《学习》。南京来的人说：“他们过去一定是说相声的。”

一所汉奸演的剧叫《从黑暗走向光明》，反映在管理所的改造生活。有一个叫任广福的汉奸，痛哭流涕地说（演员的台词）：“我们这一群丧心病狂的卖国贼，人所痛恨的汉奸，在解放后，人民没有杀我们，还给予我们这样人道主义的改造照顾……我们过去喝劳苦大众的血。现在，人民的功臣，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血输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复生，共产党就是我们再生的父母……”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心想，旧社会住监狱，是看守人员勒索敲诈犯人，辱骂拷打犯人，有病不给看，还希望病人死。死后可以把犯人的东西贪污。今天，管理所的干部给汉奸输血！如果不到这里来，真无法相信。这

个剧大家都受了感动，有的说：“政府把心都掏给我们了，如果再不相信政府的话，就不是人！”我心想，1957年的新年文娱活动既娱乐了，又受到了教育。过了新年，大家兴致勃勃地迎接到来的抚顺的第一个春节。

这时从武汉、南京来的人已感到冷并不可怕。他们没来之时，有人说东北天气冷，小便要用小棍敲，不然马上就得冻。可是到了这里，室外虽然零下20多度，但屋里放暖气温暖如春，于是对冷的恐惧消失了。

由于来了这么多的人，相互认识的老朋友、旧同事都见了面，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照不宣。这些人中，我只认识鲍志鸿，他是军统局一处少将处长，见过面，没有来往。陈旭东认识的人多。这个陈烈新大概不是陈旭东的堂弟，可能是重名。

腊月二十七开始包饺子，由大厨房给剁好饺子馅，抬来几大桶和好的面。3、4所一齐包饺子，有的包，有的送，说说笑笑，真像一个大家庭。我一看眼前的情景，想起1948年于长春，当时从哈尔滨带来一些解放团的画片，上面有打球的，有看书报的，这些画报到了我的手，我笑了笑，“八路对俘去的军官真能这样？我才不相信呢？这不过是他们自己化妆照的，送过来做宣传而已。”可是眼前这些情景我信不信呢？我自己就在其中，我信。因为这是事实。从前的想法也不奇怪，自己不断的杀共产党人，认为共产党把我们的人抓去绝不会轻饶，一定要以牙还牙，加以屠杀。有一个先人为主的反动的唯心思想。就像戴笠于1942年3月，在西安对军统特务说的：“共产党就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他们把坏说成建设，他们好也是坏，坏的更坏。”现在一看，这是蛮不讲理。

这样优待，应该促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复苏。

春节前洗了澡，理了发，每人从里到外，从头上到脚下都收拾得十分干净。屋内的一切都认真的打扫了，玻璃擦得雪亮。搞文娱的人，加紧练自己的节目，每个人的脸上呈现出笑容。除夕发了花生、糖块、苹果，晚饭炖鱼，年年有鱼（余）。晚饭后大家自由活动，下

棋、唱戏、打百分，走廊上挂着五光十色的花环，灯光辉煌，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新气象，仿佛荡漾在温暖的海洋。我在这时候想到的是：太好了，我不像是在管教所，我像在一个朋友家中，只是我的家人没来。共产党待我这样好，我怎么报答也报答不了。旧话说：“重恩不言报”，就是重恩报不了，只有竭力报答，永世记在心头，告诉我的后人，重恩报不了也要报，做多少是多少。

夜半，按照东北人的习惯要吃一顿饺子，小的时候叫“吃圆宝”，南方没有这种习惯。我吃饺子的时候，想到全国除了台湾全部解放了，在今夕是不是全国人民都能像我们这样吃上饺子呢？不一定。人民生活肯定是提高了，没有饿死的人，但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与我们一样的水平，我们是较高的，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特殊照顾。

吃完了饺子，肚子撑得饱饱的，上床睡觉太不舒服，于是我们在走廊里打起了锣鼓，扭起了秧歌……

“战犯”帽子有点大

大年初一，白天有我们的节目，因为我清唱《二进宫》一段青衣，只吃了十个饺子。报幕由我担任，报幕的内容是我拟的，主要是感激共产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给我们安排了文娱演出。报幕词的头一句话写的是“同学们”，我们到这儿究竟怎样称呼呢？政府没明确指出。去年在辽宁公安厅看守所的时候，不叫犯人，互相不叫，政府人员也不叫。可是到这之后，接着又来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犯人呢？还是同学呀？南京来的人称同学，这是一个问号。于是我要了一个心眼，我拿着报幕词对崔科员说：“我拟了一个报幕词，请科员看一下，行不行？”

崔科员看了一下说：“可以。”

“报告科员，前面称同学，还是称同犯？”

崔科员一考虑，马马虎虎地说：“行啊，什么都行。”我一听，完了，还是犯人！用“同犯”太刺激，先用一次同学吧，以后再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犯人。想想也对，在被押期间不是犯人是什么？我没有对别人说这件事，因为过春节大家正高兴呢。

初一上午，政府给我们 29 个人一个光荣任务，叫我们挑一些人到大厨房去做饭做菜。刘荣第、高青山和 3 个生活组长研究了一下，挑出来 8 个人，我没去，因为我搞文娱节目，我对刘荣第说：“咱们能够把这件工作争取到手，是政府对我们信任，说明你这个生活大组长带动得好（我故意拍了他一下），这个任务咱们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接着我又小声嘱咐说，“到厨房可别妄作主张，听师傅的指导，咱们的人可要留神，出了事交待不了，这是大年初一。”

“我们一定注意，放心吧。”

刘荣第领着 7 个人到大厨房，我们到大俱乐部去演节目。崔科员领一个人在那儿装置广播机，这个人号牌是一千多号，这里有这么多的犯人吗？这个人说的是中国话，一定是汉奸。他对广播机是熟手，不一会儿就装置好了。我们的节目都很精彩，有一个活洋片，是我们从长春监狱学来的，洋片是真人，比如政府关心我们身体健康，洋片里就有一个医务人员手拿听诊器，给一个犯人诊病，两个人拉着唱着：“往里瞧，往里观，看了那片，再看这片——看吧，有骨头有肉真的一样，活的一般，这一片大夫诊病照在上面，大病小病一齐看，有了急病到床前……”这个形式大家都没看见过，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我们 29 个人全部上台，没有死角，集体参加了文娱活动。一辈子没上过舞台的赵广元、杨文泉、王建民也参加了，他们说：“有生第一次上舞台，真有意思。咱们高兴，政府人员也高兴。”

武汉、南京来的人也演出不少节目。武汉的歌舞好，南京的京戏好，我们的杂耍好，各有妙处，都有特点。

正月初三，我把节目演完了，身上没有了负担，我争取到了去

厨房做饭。那一天，有刘荣第、姜明文、张大光、欧阳午、李仲章、陈燕茂和我。晚上的饭菜单上有规定，是 60 斤牛肉炖萝卜，20 斤白糖蒸馒头和花卷。我一看菜单才知道，我们每天吃饭都有规定，不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也不是厨房师傅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厨房还有这么些制度真想不到。我这个人就是言行不一致，我告诉刘荣第到厨房不要妄作主张，听师傅的话，可是这回我到了厨房，一看菜单心里便想开了：牛肉炖萝卜，吃花卷就可以了，用不着放糖蒸馒头，加上我不喜欢吃糖，我便对刘荣第小声说：“这 20 斤白糖我看别搁了。”“不搁也行。”他同意了。

厨房有个钟师傅，很年轻，人很老实，我切萝卜，他站在我身边问：“那个相声是你说的吧？”我笑了，他说：“说得好。”

“报告师傅，这 20 斤白糖不要放了，牛肉炖萝卜是咸的，糖是甜的，不合口味。”

“菜单上有，还是要放。”他坚持说。

“大家不怎么喜欢这样吃呀！”我这是胡说，什么大家，只是东北人不愿这么吃，现在是刘荣第与我不愿这样吃。

呆了一会儿，钟师傅出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他说：“这 20 斤白糖不放了。”他把白糖又放回那个小屋子里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不仅学习，开会有计划、有步骤，就是吃东西也有计划、有准备，政府对我们用了多少心哪，这不过是几百件中的一件而已。

在大厨房看到起居时间表，前边有“犯人”二字，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身份都是犯人。这个问题明确了。

过了春节，尚传道写材料提纲，纸上印有“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字样。尚传道一说，我才知道我们是战犯。“战犯”二字太刺激了，我才是“上校”，也不够战犯，1949 年 1 月，人民政府公布战犯名单，蒋介石以下共计有 43 名。起码文官是特任，武官在上将以上，一个中将军长都列不到战犯名单之内，我们这些小家伙怎么能称战犯！合乎实际情况吗？如果说我们有罪，那是不成问题的，“战犯”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有点大。

1948年12月，在长春公安局看守所被押时，有一天在厕所里遇见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他小声对我说：“咱们都是小战犯，不好办哪。”摇摇头唉了一声，表示无可奈何。我听他这么一说，认为他是过于悲观。可能这个思想成了负担，后来他病死在公安局看守所，现在，袁家佩说的“咱们都是小战犯”这句话兑现了，袁家佩真有先见之明，可惜死得太早，不然他也得到这儿来改造。

2月底，金科长宣布成立学委会，由王仲模、蔡省三担任正副主任，严毅、姚轻耘、刘荣第、刘庄如、曾传坦、田文奎为委员，高青山和张普林为学委会的干事。学委会领导大家进行学习与劳动。我对这些委员没有意见，因为别的人不认识，只认识刘荣第一个人，他是我们29个人的生活大组长，靠近政府做得好，他当委员完全可以。刘荣第当学委与我没有坏处，可是尚传道对刘荣第当学委，高青山当干事不服，他认为学委会应当有他。学委会成立的第三天，规定学习时间及学习内容，尚传道一看就反对，那时他是68号的学习组长，他在小组里说：“这样规定怎么能行呢？学委会也不找各组长研究一下，就公布了这个表，太不合适。”他在组里振振有词，牢骚满腹，他怎么这样呢？也许因为他在公安局看守所住了8年的单房（除了1950年冬与我在一起住过几个月，其余都是单人监），每天看报、看书，社会现实一无所知，并且没住过监狱，不知道犯人应当怎么做，他可能把这个学委会比作清华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那时他是自治会的主席，学生自治会可以自己搞一套。可是现在我们是犯人，犯人学委会可以随便规定⁹一套学习制度吗？他没有多考虑，自命不凡，犯了一个反抗政府的错误，受到吕科长的批评。

吕科长常与我谈话，去年在一所谓号的事情也弄明白了，调号是我多心，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张禹斌当生活组长，就偏把我调到那个号，为什么调号呢？因为我原来住的那个号没有学习组长，调刘荣第去当学习组长，这样便需要调过来一个人，因此把我调过来了，如果当时班长或科员这样告诉我，我就不会有那种错误的想法。在犯人身上一件小事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或粗枝大叶的说儿

句，可能会出大事，这是我的切身经验。

吕科长批评我们这 29 个人展不开批评。的确，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讲究情面，经过吕科长这一指出，我们组织了一个墙报，展开批评。第一个稿子是我写的，批评段克文，在搬仓库时，段克文看到一些蓝棉帽子，就提出来用旧帽子换一顶新帽，负责的刘科长不同意，段克文便一再恳求，刘科长只好同意他换了一顶新的蓝棉帽子，回来我批评他，他说：“这是政府批准的，又不是我私自拿的。”大家都不同意他这种作法，可是无人当面提。我的批评稿子就是批评他这种见东西就要的坏毛病。这一批评，段克文吵闹不休，我没理他。接着别人也展开相互批评。

大家还就毛主席的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展开争论。

有人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团结的对象？”

有人说 是，有人说 不是。于是又在墙报上展开了争论。有的人想息事宁人，便说：“这个问题争论它干什么？由政府人员下一个结论不就明确了！”

张禹斌写了一篇墙报说：“我们是战犯，不是团结的对象，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到被团结的对象。”我认为张禹斌这个看法是对的。后来刘荣第请示崔科员，崔科员说：“你们叫政府给你们打保票吗？好好争取就是了。”

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有人认为我们是人民，所以说我们是团结的对象；有人说我们是战犯，根本不是人民，你们硬要往共产党那方面靠，人家也不要你。人家团结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团结战犯干什么？将来改造好了，那才是团结的对象，现在这样讲是假进步，太不自量。

金木水火土

所方规定，我们来自东北的 29 个战犯，因集中于辽宁沈阳而称之为辽宁队，南京来的叫南京队，武汉来的叫武汉队，北京来的叫北京队，一共有 240 人左右。

3月初的一天下午，孙所长找我与陈旭东谈话。先找陈旭东谈了半小时，又找我。我到哪个改造机关负责人都要找谈话，因为我是特务，需要加强管教，这里也是如此，孙所长问：“你叫关梦龄吗？”

“我叫关梦龄。”

“到这有多少日子了？”他手拿着报纸，似乎无所用心的样子。

“5个多月了。”

“这里有多少人？”

“有三百多人吧。”我心想，对一般战犯怎能如此的问话。

接着谈了一些政策，又问了我的改造经过，最后叫我写两份材料，一份是写我自己的全部材料，从 8 岁写起，写到被捕；另一份写辽宁队战犯的思想情况，每人一份，我问：“我自己的思想情况写不写？”

“也可以写。”

再没有谈什么我就回来了。由这开始天天写这两份材料。我想这里的军统特务大的有、中的有，为什么叫我写这两份材料呢？可能提前处理我！不对，陈旭东在孙所长的眼睛里是个调皮分子，跟他一块没有好处。不过我在这里没犯错误，也不会有坏处。大概是公安厅要材料，我写了 20 多天，我个人的材料写了一百多页，辽宁队的战犯的思想材料 30 多页，一并在 3 月底交给了政府。

学习毛主席在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的一篇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很用心的学习。这篇著作共有十二个问题,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几段我反复读,写了学习笔记,其他关于工农业等问题,只是一般的看了一下。

在肃反问题上,毛主席说:“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

这个文件帮助我理解了许多国际或国内问题。只有感性的东西,没有理论水平,仅从眼前的物质生活感激政府,那是不能生根的,尤其毛主席的著作更要深透的学习。虽然在学习上有一些收获,但也有一些错误想法,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共产党伟大的地方,最后说要“宣布平反”,我一想,平反就要来一个检查,文件内也说,“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如果来一次大检查,我被判的刑比较轻是不是再加刑?这也是问题,错了要纠,重了要减,判轻了不也要加重吗?我又一想这是肃反,我的问题属于镇反,也许不是一码事。不对,肃反与镇反都是针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分开来看……心中疑惑,想了一阵,最后认为不会再加刑,因为这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判刑的,可能无形中延期,这是将来的问题,这些想法过了几天就消失了。

政府组织我们到菜地劳动。到菜地劳动可以晒晒太阳,透透空气,玩一玩,比在屋子里好多了。解放后,我在长春监狱参加过劳改,那是做胶皮鞋,轻微的劳动,体力没有锻炼出来。用铁锹翻地真累人,不一会儿浑身是汗,气喘不止。心想我是不能作体力劳动的,将来政府也不会叫我们从事农业劳动。政府改造我们花了这么大

的钱,到头来叫我们种地,太不值得了。我们将来不作体力劳动是肯定的,至于作什么,这么大国家还多了我们这些人?随便什么机关都可以安置。因之大家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干,有些人在干活中马马虎虎,拔草也拔不干净。我们出来 40 人,只跟来两个班长,还是徒手,什么武器也没带。看来政府人员对我们的思想情况全部掌握了,知道我们不会逃跑,但是有个班长坐在铁路边上,他的任务一定是看着火车,怕我们叫火车碰了,想得真周到。

南京队的人在院中谈话,一个说:“政府发纸烟,你吸不吸?”另一个说:“我说恐怕不能发呀!”“辽宁队都吸呢,一样的改造还能两样待遇,连一所汉奸也吸烟。”

看来这烟吸不长久,一样的改造怎么能有两样的待遇?南京队与武汉队洗澡路过我们的屋子,看到我们在吸烟,他们能没有想法吗?我认为这是特殊,这样不好。我自觉地把烟戒掉了。我戒烟之后,李衍涛也跟之戒了。在这件事情上,黄鹤另有看法:“吸几盒烟有什么关系?不吸烟就等于进步了?”我对这话置之不理,我之所以戒烟,只是为了“不特殊”,别的我没考虑。我也没有告诉别人,劝说别人,李衍涛是自愿戒烟,黄鹤这样说实在不应当。

我的孩子关棣从徐州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附来一张小相片,说她学习很好,问我什么时候改造好?又说她妈妈和她外祖父母都好,她妈仍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信的末尾,我的岳父王悦珩附了一笔,说:“有机会计划同关棣到抚顺去看你。”又说,“这个信封是才侠(我的老婆)写的。”我看完这封信,意识到王才侠还没嫁人,不然,她写这个信封干什么?我给她们回了一封信,告诉她们我好,好,好。别的也谈不到。

过了几天,大俱乐部举行南京队与辽宁队控诉自己罪行的大组会。我对刘荣第说:“我争取在大组会上发言,控诉自己的罪行。”同时,辽宁队也有人准备在大组会上发言。刘荣第认为,我在大组会上发言有教育作用,我是被政府宽大的典型。经过他向崔科员报告,决定我在大组会上发言。我把提纲组织了一下。这次学习是管

教科主持，金科长与吕科长负责。至于我们在台上怎么讲，那是我们自己改造程度的反映，政府没有框框。那天，大组会先由姚轻耘发言，他发言的时间很长，过程多，重点不明显。他下来之后就叫我发言。关于解放前的罪恶，我举了这个事例：

1948年2月，督察处在长春大学逮捕了一个叫庞文录的学生。原因是庞文录的妹妹1947年从哈尔滨到长春，因为男朋友与人争风吃醋，便向督察处控告，说她是八路派来的女间谍。于是在1948年除夕之夜将她逮捕。在侦察中，发现她有一个哥哥在长春大学读书，于是把庞文录也抓了。庞文录被捕之后，长春大学的学生，均感愤恨，就推举代表到督察处请愿，要求把庞文录释放。长春大学学生会推举国民党长春大学的支部委员王恩孚等二人来办这件事。王恩孚是国民党员，认识一些反动派，到督察处一定要见我，我接待了他。他把来意对我说了以后，我委婉地对他做了解释，并且说：“我们对庞文录侦察明白一定释放，不会给他麻烦。”把他应付走了。过了几天，庞文录并没有放，王恩孚又来了，上午我推说不在家，下午没有办法又出面接见了。在接见时候，处长张国卿在座，王恩孚看见张国卿坐在我的旁边，没带肩章符号，不知道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王恩孚气势汹汹，以质问的态度问我：“为什么抓庞文录？”我尽力用和蔼的态度回答他，他越发理直气壮，甚至于用威胁的口吻说：“我们长大两千名同学，要求你们释放庞文录！”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有共产党嫌疑，也可以把我留下！”我用了最大的忍耐把他安慰走了，这时张国卿在旁边有点忍耐不住了，王恩孚走了之后，张国卿说：“这小子一定有政治背景，不然不能这样硬，回头叫情报科调查一下！”

情报科派长春大学的学运组组长郝铮调查，很快调查清楚了，他说：“王恩孚是民盟分子，最近要到解放区去。”这个情报一上来，张国卿就在夜间派人去长大逮捕王恩孚。当时与王恩孚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大学生，也一并逮捕来了。抓到督察处酷刑拷问，认定是民盟。督察处决定秘密处死，给警备司令部上了一个报告，新七

军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李鸿批准了。批准以后，张国卿与我研究怎样处死这两个学生，我说用毒药把他们毒死。张国卿说不行，如果服了毒药肚子一疼，一叫唤，不秘密，这个办法不好。我又说不能毒死，那就活埋，在督察处后院破楼里挖一个坑，把他们埋进去就行了。这个办法张国卿同意，我派了四个基本特务，先在后院的破楼里挖了一个坑，决定在当晚九点执行。

可是这天晚上我在家中开舞会，来了许多男女朋友，我把这件事忘了。到了9点钟，督察处来电话找我，我才想起来。马上到了督察处，张国卿已经去了。张国卿过去在上海做过潜伏，但没做过行动。我告诉他拿个大棒子，站在大坑边上，等王恩孚到了，从后脑海打一棒子就埋。我又告诉了这几个特务如何动作。一切都布置好了，命令把王恩孚带来。王恩孚被捕之后，有一天给他用刑，被我遇见了，他对我说：“督察长，我年轻不会说话，请督察长不要怪我，我什么也不是。”我对他说：“你如果是民盟就承认，没有什么，如果真不是就不难为你。”这么敷衍了一下。这天晚上把他提出来，我先问明他姓名、年龄等项，这是处死之前验明正身，我问完了，他说：“报告督察长，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好出风头，什么是民盟我都不懂得。”我听了一下对他说：“今晚上把你送到兵团军法处，你这个事我们已经侦察明白，没有关系了，到军法处再过一堂就可以释放，能找到保吗？”他说：“能找到。”我说：“那好。白天送你到兵团，被你的同学遇见了又要起哄，夜里好一些，走吧。”特务把他的眼睛蒙上，嘴里塞进棉花，两个人架到后院。王恩孚架走之后，又提第二个，姓韩，名字我忘记了，这个学生有20岁，中等个，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长得挺招人爱。来了之后，我问了他的年龄、籍贯。他说：“我是去王恩孚那屋串门，正赶上抓他，也把我抓来了。我不知王恩孚的事情，到这之后，也给我上刑……”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一听这可怎么好？非处死他不行，公事已经批下来了！这么一个20岁的大学生，无罪处死，我的心中有了问号，但是不处死也不行呀，我一咬牙，把对王恩孚说的那一套欺骗话又重说了一遍，最后我说：“你

走吧，没有问题，到那就会释放的。”

我报告到这，我的眼泪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下边有的同犯也掉下了眼泪。

把这个学生的两手也后绑起来，眼睛蒙上黑布，嘴内塞上棉花，架着他往后院走，走到后院大破楼里，王恩孚已经大头朝下放在坑里了，这个姓韩的学生到了坑边一站，张国卿亲手拿一个大棒，用劲朝这个学生的后脑海一击，应声而倒，大头朝下往坑里栽去，四个特务立刻用铁锹撮土掩埋，因为还没开冻，土块大有空隙，这两个人没埋死，声声惨叫从坑里发出来，我赶紧叫他们去提水，把水提来，泼上水又加了一些碎土，用脚踩了一会儿，这才没了声音。就是这样，没有人性的把这两个学生活埋了。像这样的罪行，也不是这一件，以后又杀害了四十多个地工人员及进步青年。有许多酷刑，是想象不到的——用金、木、水、火、土^⑤的五刑，来虐待被捕的人。

最后，我谈了对罪恶的认识，感激政府对我的宽大，以及今后的改造决心。

报告以后，南京队用学委会的名义给我批评了一番，大字报说：“关梦龄像耍魔术似的控诉了自己的罪行。”

李衍涛不解地问我：“我看你报告得不坏，我都掉了眼泪，大字报怎么说你要魔术呢？”

我生气地说：“人家水平高，咱们不认识问题，向人家学习。”其实，我也不知哪一点错了。我当然不能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一想算了，对我要求高也是好事。

大组会后，吕科长找我谈话，我对吕科长的印象很好。他与金科长在理论上很有造诣，在政策上掌握得也很稳，他找我之后首先说：“我去年对你的批评是不是还有抵触？”

“当时有抵触，过去那一阵就忘了。”

勉励我一些话后，他说：“政府对你的宽大是你争取的结果，你还要努力，继续争取。在思想改造上多下功夫，要靠近政府，起积极

作用。”

我说：“这一次大组会上的发言没报告好。”

“还是起到了教育作用，揭发匪特的罪行，对你们认罪也有好处。”最后又说，“你的相声说的编的都很好，将来在这方面要多做一些工作。日本战犯曾经编了一个剧，描写日本人民不愿当兵出征的情形。有一个人不愿当兵，把胳膊砍了下来……这个剧没有演完，观众痛哭使剧演不下去了。这样的剧就很起教育作用。你们将来可以写一些东西，把特务的罪行揭露出来。”

吕科长这次谈话对我鼓励很大。

我们的大组会开到5月中旬，对于我们认识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有的人表现得很做作，如南京队武子芬、刘之剑、李汉萍等人，在大组会上发言，上去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哭不成声，说不出话来。辽宁队的杨文泉说：“这样子搞，我来不了，不是哭的地方硬要那样，有什么意思！”我心想，他们这样表现是政府人员唆使，还是真的感到过去的罪恶对不起人民才痛哭失声？不得而知。最后，刘之剑在台上还给吕科长跪下说：“向人民赎罪！”吕科长叫他起来，他才起来。

这次控诉自己罪恶的大会，进一步认识了我们这些战犯过去所犯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初步认识到我们应当改造，不应当逍遥法外。至于个别人的表现，难说那就是真诚认罪，我认为做作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事先布置的

5月20日上午，吕科长宣布，为了加强思想改造，决定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我们的掌声立刻响了起来。从大俱乐部回到监号，大家一路上兴高采烈，不可形容。外出参观是我们改造生活

中一件最大的喜事。我的运气真好，前边有宽大政策挽救了我的性命，接着又有加速改造把我们集中，现在又要组织参观，将来还会有好事！我的前途十分光明，只要老老实实的改造，出监之期当在不远。

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着笑着，谈论这回参观都到什么地方？我说：“政府一定有安排，凡是政府认为我们需要看的，都能叫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一些学习，看了不少报纸，但对新中国的实绩了解甚少，这回叫我们看一看，和国民党比一比，要不然我们不服输，不能很好的认罪。以利改造。

洗了澡、刮了脸，衣服、鞋、袜都准备好了，政府给我们编了队，把我们与北京队编在一个中队，因为这两个队都是崔科员领导的。编队之后，又派了中队长，我们的中队长是田文奎与刘荣第。对于病号政府又费了许多口舌，这些病号一定要去，政府没有办法，只要能行动的便准予随队参观。

政府人员对我们像老人对孩子出门似的，再三叮嘱，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以至“小孩子”感到厌烦，认为“老太太”太罗嗦了，肖兆林说得好：“政府人员把我们当作老小孩看待，微末细节也考虑到了。”

21日上午8时，我们与一所的汉奸乘坐七辆大汽车向郊外驶去。车走了一点多钟，到了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下了汽车，到一个小学校前面休息。不一会儿合作社王主任给我们做报告，当报告到蒋匪军到他们这个村子，骚扰老百姓的时候，南京队学委王仲模大喊一声：“跪下！”大家都跪下了，跪下就哭。我当时没有眼泪，因为只听王主任说蒋匪军的士兵到村子抓鸡、杀猪、抓壮丁，这些行为固然不对，不过还不是“三光”政策，感情还没到那地步，因而泪水掉不下来。

王主任的报告我们是跪着听的。

接着我们开始参观台山堡的合作社。这个社比较富裕，暖室、

电磨，应有尽有，社员收入都很多。

一个脚穿蓝球鞋，手拿鞭子的老头对我们说：“我在解放前活了70多岁，吃的大米没有解放后吃得多。现在我们这个村子，吃大米容易，吃高粱米却不容易。我80岁了还放羊，身板也硬朗，精神也高兴！”

这是人民的声音，是我直接听到的。由这几句话，可以说说明解放后的几年，比解放前70多年都好。尤其令人信服的是，这不是共产党做的宣传工作，而是真实情况。这个老头从山上放羊回来，一看到我们这么多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不知是干什么的？他在我们旁边一站，我们就与他谈上了。他随便的就谈出了以上的那些话。我心里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老头的高兴是真的，不是做作，尤其可贵的是，这个人不是事先布置的，不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在卧龙岗的那一番布置。

参观了一个上午，回来在小学校院子里吃饭。我们自己带去的面包、肉足够了，合作社还给我们每人一个鸡蛋。大家认为不该受领，政府叫我们吃，我们只好接受了。

饭后，每组派一个人去家庭访问，这组选举我去的，由崔科员领着，另有社的干部陪同。我们访问这家有个老大娘。我们几个人见了老大娘，立刻跪下谢罪，告诉她我们是战犯，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今天来谢罪。我们这一举动，把老大娘愣住了，她叫我们赶紧站起来。她谈了许多解放前后的事情，伪满生活极苦，国民党来了更坏，只有解放后，全家才得救。现在有三个劳动力，生活富裕。老大娘越说越高兴，最后说：“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抚顺，我们再呆下去就要饿死，那就没有今天了。现在的日子多好哇，不愁吃不愁穿，这差人赶上好时候了。”

老大娘的一席话，使我领会到人民对国民党恨之人骨，共产党毛主席深为人民所爱戴。人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是从心里拥护，是从他们切身利益上拥护。这一点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挑拨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是说反动派想要变天，国民党想

打回大陆,那都是做梦。我们这些战犯如果谁还幻想蒋美卷土重来,那才是不看事实,自绝人民。

5月22日,参观抚顺露天矿。看到一列一列的小火车在繁忙的运输,大电铲一下子铲起两吨半煤。这么一大片的煤矿层,如果不是被日本鬼和国民党那样乱采乱开,出煤的数量还要多。我想起1947年,国民党207师在抚顺市驻守。师长罗又伦成了抚顺一霸,他利用工人开采的煤投机倒把,赚了很多钱。利用煤做投机生意,不仅一个罗又伦,还有很多人,可是抚顺煤矿工人却吃不上,穿不上。

从露天煤矿参观出来,又派了一些代表去参观工人养老院。他们参观回来说:“真想不到煤矿工人的生活有那样好,收工之后,又洗澡、又照太阳灯,医疗设备十分齐全。这样的生活过去哪些下级职员也办不到。”

午后,又参观了抚顺市工人疗养院。这些老人住着三层大楼,院子种着各种花卉,每月给他们一些养老金。吃完了饭,有的下棋,有的赏花,这种晚年的幸福生活在解放前是想也想不到的。

23日、24日,到沈阳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工业展览馆、第一机床厂、百货商店、体育馆、风动工具厂、电缆厂,游览了北陵、东陵。

参观中,我几次联想到解放前沈阳的情况,我亲眼所见,工厂驻进了部队,厂房成了马棚,各工厂的烟筒均不冒烟了。日伪开办的工厂,国民党接收以后,前门贴封条站上门岗,后门拉东西。所谓接收,实质是“劫搜”。1947年我在沈阳,看到马路上到处是卖衣服的、卖破烂的。小贩、窃盗、娼妓、骗子遍布全城,工厂最多的铁西区也是一片凄凉景象。当时我与沈阳一些亲友交谈,我把责任推给了共产党,我说:“如果共产党不打仗,就不能这样!”有的人被我欺骗了,也顺口说:“希望把八路早日打垮,好过太平日子。”

我7岁时从故乡新宾到沈阳,那时是张作霖统治东北,我虽然年幼,也记忆一些东西。现在沈阳变化很大。从前南湖是个臭水泡

子，现在建成了人工湖。工学院的建筑壮观美丽，新建了一片又一片的大楼。参观前我想，沈阳的楼房大都是日本鬼子时代建筑起来的，解放后，人民政府也需要利用日本鬼子的建筑，自己不会骤然间建筑起来多少大楼，因为时间有限。可是这次参观，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问题不用辩论，大楼摆那儿，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见。我钦佩共产党领导得好，建设得快。在伪满时期，盖一个大楼一般都需要二三年，长春的中央银行花了七年多才盖好。我仔细一想，沈阳为什么建设得这么快呢？在长春我听说，中国建筑工人给日本鬼子干活“磨洋工”，偷工减料，有监工的看着也不行，所以工程进度迟缓，一所大楼最少也要二年或三年。解放后工人当家，意识到这是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工作中不挨打、不受气，吃得饱、穿得暖，干活的劲头就来了。我这么一想，也就想通了。

参观电缆厂，这座工厂是苏联帮助建设起来的，其中有一架 60 头的卷线机是苏联的第一部产品，表现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

又参观了北陵和东陵。我小的时候到过这些地方游玩，旧地重游，看到这些地方比过去更美丽了。1947 年冬国民党军队，派兵到东陵伐树，构筑城防工事，现在山上还有残痕，风景区的大树砍掉再长起来需要多少年哪？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参观沈阳百货商店，我们看到许多种类的中国产品。我是最喜欢用外国东西的，崇美思想支配我，认为中国的东西不如美国好。一些针织品，上海的还可以用，但也不如日本。这回到百货商店仔细一看，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如皮鞋、呢绒、丝织品，外观漂亮，质量坚实，不次于美国货。

百货商店的顾客很多，十分拥挤，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来买这些日用品。在解放前，沈阳和平区的几个私人百货商店，以及沈阳城内的“吉顺丝房”那样的大商号，门前冷落，没有几个人去买东西。现在是顾客盈门，买呢绒、买皮鞋的人数不少。我心想这不是购买一双皮鞋，这不是单纯的商业兴盛，是整个

国民经济好转，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的结果，百货商店兴盛也说明农业在发展，没有农业就不会有轻工业，也不会有这么些商品，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从百货商店出来，看到街上站满了人，人们在看我们，他们一定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可能围着溥仪这个伪满的皇帝吧？人们一边看我们，一边小声议论，有一个人说：“他们都是大官，过去都是坐小汽车的。”

我想，人们如果知道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又知道我们被政府宽大，他们一定有意见，会要求枪毙我们。

从沈阳参观回来已经是月底了，这时犯人中有一种侥幸想法，认为日本战犯在1956年夏，参观之后便释放回国了。我们是1957年参观，也是夏天，参观之后可能释放！我没有这种想法，我认为中国战犯与日本战犯不同，孙所长报告说得明白：“对你们要求加速改造，对日本战犯没有提出这个口号。”

当然我希望成为事实，参观之后释放最好了。

又有人说，西南岗楼上的哨兵撤消了，与释放我们有关系。大家这样说，我都寄以希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事实。

这时期锅炉检修，不能洗澡，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在屋里弄点水擦擦背也不方便。我心想，在长春公安局四年，总共洗了不到十次澡，开始连脸都不洗，现在几个礼拜不洗澡便感到不舒服了，真是不知足。

谢 罪

在6月初的一个大组会上，吕科长又宣布一条好消息：由明日开始继续参观！于是又赢得我们一片热烈的掌声，并且透露此次到北满参观。我兴奋之余，私下安排了一个参观日程：到长春参观第

一汽车制造厂，到哈尔滨参观亚麻厂……病号坚持随队参观，用他们的话说：“这样的参观史无前例，这样的参观一般干部也没条件哪！”大家又议论了，这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有人说住工厂，我说可以住学校，有人说无论如何不能住庙。这样的谈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有些人坚持认为自己说得对，强迫别人接受他的看法，我们战犯的争吵有时就是这样引起的。

专车一直向北开去……我心里很不安，认为到长春一定下车。下午一点到长春，车只停了 20 分钟，继续北行！我知道回来是要停的。二次回长春，怎么见长春人民？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负担。

下午火车到哈尔滨车站，这个地方我从前没有来过，这是北满的一个大都市。我们住进哈尔滨旅馆。旅馆的设施使我惊异非常，钢丝床、皮沙发、地毯、绸子被，这样的饭店一天要许多钱呀！这时刘荣第对我说：“这是哈尔滨最好的饭店，老名字叫‘马迪尔’，一般人来不了这个地方。这个旅馆有舞厅，有餐厅，有电影院，大得很，咱们怎么能住这里呢？”

辽宁队各组都住好了，金科长来了，他看了一下我们的铺位，很关心地问了问情况。我说：“报告科长，我们住这样好的饭店太浪费了，住一般的旅馆满可以了。”

金科长说：“政府为了照顾你们的休息，参观，所以安排在这个饭店，方才还有一些旅客住在这里，临时动员他们迁到别的旅馆。”

我想在抚顺，我们说到哈尔滨住工厂，住学校，还有说住庙的，为此还抬杠来，现在在事实面前感到我们这些人就是好唯心的武断，这件事又给了我们一个耳光。

共产党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这又是一例。

晚上，我们在浴室洗了澡，洗完澡喝茶，大家坐在沙发上谈天。感到这次参观政府花的人力、物力太大，我们是罪人，又不是人民的功臣，于情于理均有不合。入夜，我躺在钢丝床上，盖着绸子被，联想到 1955 年 11 月，在长春监狱戴上脚镣子睡觉的情形，与今夜相比，真是不堪回首！我的思想有时很特别，从这一件事像箭一样

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第二天，在楼下餐厅吃早点。只有我们吃上饭，干部才能坐下吃饭，白科长和金科长等人就像在家里一样，把孩子都安顿好了，大人才能吃饭，等大人端起饭碗，孩子们吃完饭又闹起来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先吃，干部后吃，干部还没吃完饭，我们就要大便，真是啼笑皆非。于是干部就得抓紧，班长们不是细嚼慢咽，而是狼吞虎咽，把饭碗一放，带犯人去大便。我们有许多人不顾干部和班长的辛苦，一会儿要求这个，一会儿又要求那个，就像一些不懂事的孩子，缠着妈妈不放手。

早点后，我们到兆麟公园参观。在李兆麟将军的墓前，我为良心所驱使，跪下了，掉下了忏悔的眼泪。因为心情难过，虽然在兆麟公园游逛了好多时候，看了许多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却没有往脑子里去，只记得有一个孔雀，还有一个三条腿的猪，一些猴子，其他的东西我记不住了。

从兆麟公园出来，坐汽车游览市容，到了水道街那一带，车上的解说员介绍说：“这是水道街，1946年3月9日，在水道街的光明医院，军统特务把李兆麟将军杀害。前边拐角的地方，就是光明医院的旧址。”我一听真难过，我们这些人到处留有血债。

第二天参观了电表仪器厂、量具刃具厂、亚麻厂、电机厂、毛织厂，这些工厂除了毛织厂是过去已有的，其它工厂都是解放后新建的。

量具刃具厂，在厂外看不出是工厂，仿佛到了图书馆，一点声音也没有。工厂全是现代化机器，生产的产品十分精密。我看到一些工人是南方人，从这些人的籍贯来说就不简单。哈尔滨天气冷，冬天需要燃料和冬服，比上海费钱。解放后工人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加上政府的动员，上海工人也能到冬天零下40度的地方工作，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事情。我在工厂食堂看到一个“无人售货台”，没有人看管，买咸菜自己拿，自己把钱放在箱子里，这是新社会的新风气。旧社会买东西有人在那看着，还有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多

拿呢。

哈尔滨毛织厂在十八道街。崔科员对我们说：“解放前这一带冻死饿死的人多得很，扎吗啡、抽白面的人，都到这个地方集合，干什么下流勾当的都有。解放以后这些地方都干净了，每个人都有正业。不劳动不得食，不学好吃不上饭。”这个毛织厂是公私合营的产物。解放前说哈尔滨有俄国毯子，就是这个工厂的出品。工厂有许多女工。机器都是旧的，厂房也很老，可是工人劳动都很积极，表现出主人翁的劲头。成品很好看，一床床娇黄色的毛毯，上面织有花卉，毯边镶着古铜色缎子，看着毛茸茸的，美观得很。这个工厂的机器是木头做的，还能革新，扩充一下能成为北满第一大毛织厂。

哈尔滨的风俗习惯有点欧风，男女青年走起路来都扬着脸，挺着胸脯，别有一种劲头。

下午，到东北烈士馆参观，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心就沉重起来。我们在东北烈士馆门前下了车，把帽子摘下来，进了烈士馆。馆内庄严肃穆，由解说员一一解说。我想，我正是这些烈士的敌人。现在我面对着死难的烈士内心感到形容不出来的愧悔。

走进烈士馆的附设室，解说员出乎意料地指着一幅照片说：“这是美蒋特务于1948年，在长春解放前夕，惨杀我党地下工作者及爱国青年的图片。躺着的是被害人，两手被绑着，嘴里塞进棉絮，眼睛用黑布蒙着，这几十个人都是这样被杀害的。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这些被害人从地下挖出来，予以棺殓掩埋……”

我一听，就像谁猛打我一拳似的，轰地一下，我马上跪在了这幅图片的前面。忏悔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解说员仿佛代表千千万万人民对我控诉。我在事实面前感到恐惧慌愧，不知所措的怔住了。我意识到良心上的责罚比肉体上的责罚更痛苦。

在东北抗联纪念室，我们看到了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抗联队伍在万般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所使用的武器，所吃的草根树皮等实物。烈士馆馆长，给我们介绍杨靖宇的遗事，内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杨靖宇所率领的抗联武装，在日本军队和伪军四

面围剿的情况下，弹尽粮绝，同志们吃草根，女同志生了孩子掐死……种种的艰苦并没有使杨靖宇将军及其所率领的战士灰心，他们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给日伪军队不小的打击，最后终因人数较少，杨靖宇被敌人杀害。杨靖宇将军是抗日的英雄，革命的功臣。对比一下国民党抗日自惭形秽。

从东北烈士馆参观出来，回到饭店，桌上的饭菜不像往日那样一扫而光，而是剩下不少。我们许多人心情太激动，太紧张，感到烈士馆里的烈士与我们这些战犯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还活着，并且活得很好，真不该呀。往日的欢笑在房间里消失了。吃完饭都默默无语地想着各自的心事，我自己偏重想特别室那些照片。我想，督察处在长春的罪恶一定随着照片附带来许多说明，包括我在现场的指挥活动，我原来想，自己的罪恶仅只长春知道，可是1949年《东北日报》就把长春督察处的罪恶报道了一番。这次参观，我以为长春可能有个展览会，不意，在哈尔滨也展了出来！这就说明，不仅长春人民恨我，许多地方的人民也都恨我。

6点钟把我们集合到楼下的电影院开会，1所与我们3、4所的战犯都到齐了。金科长要我们谈谈参观哈尔滨的感想，大家都举起手来，1所的溥仪发了言，他说：“我是傀儡皇帝，认贼作父，丧心病狂。与日寇勾结，对东北人民进行压榨，给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死亡。这次参观我认识到，哈尔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过这样好的生活。我的罪恶十分严重，对不起哈尔滨人民，参观回去一定要好好改造……”

其他犯人也说了话。最后，由黑龙江省公安厅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6月9日，9点钟乘汽车离开饭店到车站。这辆汽车每天拉我们到各处参观，给了我们许多方便，我们向司机鼓掌致敬，表示感谢。

在火车上，我们谈论在哈尔滨的感受，有人说：“夜里白科长到各房间给犯人盖被子，别的干部也是这样。”

又有人说：“鲍志鸿的女儿到饭店看他来了！”

“他女儿怎么知道他来的？他女儿在哪儿？”

“是政府通知鲍志鸿的女儿，她才来看的，他女儿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书。”

“哦，政府想得真周到，不然父女见面可不容易。”

“如果你家属在哈尔滨，这回不也能见面了。”

“可惜不在哈尔滨。”

我想说说我的感受，一言难尽哪，我的全部感想表达在我日后写给东北烈士馆的一封信上，原文如下：

哈尔滨东北烈士馆

尊敬的馆长和全馆干部：

我们在 6 月 8 日到您馆参观（与其说是参观，在我说应当是谢罪），承您及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解说与教育，对于我们改造有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向您和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哈市做了 4 天的参观，在工厂里有许多新产品，过去我国不能制造的，现在我们能够大批的生产了。哈尔滨市由过去的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高大建筑相继出现。哈尔滨市作为一个老解放区，随着祖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也朝气勃勃的向前发展。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有许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这不仅是英雄的哈尔滨市 150 万人的光荣，也是全国人民的光荣。

在参观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烈士馆。6 月 8 日的下午，我以严肃心情走进了烈士馆。当时，我那十分激动的和无限悔愧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既哀悼死去的烈士，又悔恨自己的罪恶，我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精神异常的痛苦。

我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解放前长期效忠蒋帮，无恶不做，一贯仇视人民。1948年我是长春督察处的督察长，我的名字在你们的材料中不会是很生疏的，也是人民所痛恨的。在1948年，我们在长春作垂死挣扎的时候，由我指挥的罪恶活动，先后杀害了人民政府地工人及爱国青年四五十人，这个严重的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在烈士馆的附设室，听到解说员解说了匪特在长春的血腥罪行，如杀害地工人等。这些惨无人道的勾当，就是在我的指挥下干出来的。回忆这些罪恶，面对死难烈士的遗像，使我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深重，我跪下，我痛哭，我向死难的烈士谢罪。解说员的声音仿佛是千万人民向我控诉，我受到正义的制裁，我不是人，我是最可恶的豺狼野兽！

在李兆麟将军的纪念室，我更为痛心。李将军在伪满统治时期与日寇苦战十四年如一日，艰险备尝，功绩卓著。在“九·三”胜利后，竟被军统局的分子——我们这群野兽们杀害。李将军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而死在特务的迫害下。李将军是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的功臣，人民正需要他的时候，他被迫害了，这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损失。我瞻仰李将军的遗像，我悔愧无地，因为杀害李将军的刽子手刘一之、夏芳庭等人，由哈市逃到长春之后，均由督察处晋级录用。而我这个顽固已极的特务还对这些刽子手说：“脱离现场的技术不好，还应当加强。”

我这样鼓励他们多杀人，杀更多的人，在李将军的遗像前回忆起来，我觉得对不起宽大改造我的共产党。内心责备自己，我默默向李将军发誓：“我过去是您的仇人，我们杀害了您，我认识到了这个罪恶的危害性，我对不起您，我向您谢罪。我痛悔过去，我要好好改造，由野兽变成一个善良的人民，我不会忘了我的罪行，我也不会忘了共

产党对我的宽大，我的余生献给祖国，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立功赎罪！”

听了杨靖宇将军的英勇事迹的报告，给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北抗联在日伪统治的年月，苦战了14年，打消了我过去“东北抗联在东北活动是不可能的，即便有抗联，人数也不会多，活动范围也不会广”的错误想法；另一个问题，知道东北抗联与日寇的斗争，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武器弹药，冰天雪地，终于在1945年配合苏联红军获得了东北的解放。由此，我深刻认识到，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国民党是不抗战，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

杨靖宇将军率领人民武装与日寇血拼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和日寇进行谈降的时候。东北烈士为解放东北人民而艰苦斗争的时期，正是我们这些战犯向人民进行疯狂镇压的日子。听到杨靖宇将军及所有烈士们为解放事业而自我牺牲的忠勇业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敌人胆寒，使国人爱戴。我们这些战犯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升官发财之外，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表现，面对烈士坚贞不屈的英灵，我们是无地自容的。

在烈士馆我看到一位中年妇人，穿着素服，愁容满面地注视着我们。当时，我想到这位妇人为什么那样抑郁惆怅呢？是不是她的丈夫，或是她的亲人被我们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呢？如果她是烈属，她对我们又是怎样的看法呢？想到这我掉下了眼泪，我应当向她谢罪，我也应当受到人民的严厉惩处。由于我们丧心病狂的为非作歹，使多少家庭不能团聚，使多少孤儿寡妇失掉了父亲和丈夫！这些罪恶都要由我们负责。不应该死的人，倒被我们杀害，应当死的我们，反而得到人民的宽大。由此，我深刻的认识了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有改造人类的伟大抱负，以人道主

义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我们，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所以，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造之恩。

在烈士馆的参观，使我们有了向烈士们，向人民谢罪的机会，使我们更能了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为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精神，这是人们学习的榜样，烈士们的鲜血在东北土地上开了花，结了果，有了东北的解放，才有全国的解放，没有烈士们流血牺牲，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烈士们虽然死去，但烈士们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我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我向人民政府自首，由于政府的宽大和我主观的努力争取，使我认识了真理，知今是昨非，特别这次参观烈士馆对我有很大的教育，这与您和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分不开。我一定加速改造，来回答政府对我改造的苦心。

最后，我以悔恶向善的忠诚向您致以万分的感谢！

此致

敬礼！

战犯 关梦龄

1957年6月21日

抚顺战犯管理所

无颜见长春父老

火车向长春行进，我的心忐忑不安。去年5月24日从长春到了沈阳，今天6月9日又回到长春。一年中间换了三个改造环境。我想不到能回长春，我对长春有些顾虑，良心上有愧，感到无颜见

长春父老。

下午两点钟到了长春。我们坐的是托儿所的汽车，椅子不大。我明白了，这7辆车都是由各机关学校借来的。汽车只开了几分钟就到了吉林省政府招待所，我一看，这是解放前军民联谊社的旧址。我们辽宁队住了几个小屋子，这个招待所比不上哈尔滨旅馆。屋内没有铁床，被褥都还干净。我们这屋住7个人，每人一床，屋子不大宽绰，但能走开人。从洗脸室回来，我发现崔科员与孟班长住在楼梯下的一个小房间，我问崔科员：“这个房间太小，行吗？”他无所谓地说：“行，挺干净。”政府人员住的房子不如我们住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干部不为自己考虑，如果是反动派的官一定先找一个好房间自己住，然后才能谈到别人。想这些又觉得低估了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时期能领着政治犯去参观吗？参观什么？参观妓馆吧。

食堂在军民联谊社的楼下，是督察处第三巡查队的办公室。队长张子温是我下边的一个少校督察员，派他兼这个队的队长，综管车站附近地段的“治安”工作。他在这里抓了不少政治犯，就在这个屋吊打施刑，逼迫口供，然后解送到督察处。他这个巡查队与警察二分局斜对面，老百姓不怕警察局，就怕第三巡查队，因为这是特务机关的外勤单位。记得1948年4月，有一天，我穿个长袍在街上走，在军民联谊社的对门，有几个老百姓吵架，我走上前去问讯是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我穿个便衣，没戴帽子，像个大学生似的，没有理我，我说：“你们在大街上吵闹，围了这么些人，有碍观瞻，我好心给你们排解，你们还不耐烦了，真是不知好歹！”

“你才不知好歹！”一个商人模样的闹事者气冲冲地给我来了一下子。

“你这个人太不对了，你打架不能把拉架的也打了！”

“你少管闲事，你管不着！”他的火越来越大。

于是我朝第三巡查队的门岗一招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和武装士兵，我说：“把这个带走，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愣了，不知我是什么人，而我坐上汽车扬长而去，并且把这件事忘了。这几个人被带到第三巡查队押了两天，没敢放，第三天队长张子温给我上了个报告。我告诉他说：“没有什么，吵架斗殴，放了吧！”

就这样无缘无故把人押了两天，无人敢问。现在想起来这些事不也是罪恶吗？谁知这几个人被押之后是病了？是伤了？受了多少经济损失？

我们坐下之后，长春市人民政府人员给我们介绍长春的情况。长春是过去宽城子车站发展起来的，有 60 年历史等等，并且透露 1948 年长春饿死了 12 万人。12 万！我吓了一跳，真没想到。当时我身在长春，只知道饿死了许多老百姓，但没有统计，现在经过长春市人民政府统计，死了 12 万人，我们的罪恶不小哇。

在我们住的楼上，可以看到大街上的行人，车马，我们的右首是长春的胜利公园，1950 年在这个公园，镇压了 7 个反革命分子，其中就有督察处侦查主任翟丕翕。

我给崔科员写了一个报告，请示如果有谢罪的机会，我要报名参加，控诉自己在长春的一切。

6 月 10 日早饭，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二十人，内中有公安局的杨审讯员，他朝我点点头，笑了一笑。他怎么调做外勤了？也可能是临时执勤。我看食堂门前和招待所门前站满了人，这些人衣服都不同，一定都是公安局临时派出的执勤人员。

吃完饭，坐上汽车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玻璃仪器研究所参观。这个研究所专门研究玻璃仪器，照相机的镜头，望远镜的镜头均归这里研制。照相机镜头已经超过了德国莱克照相机的镜头。还介绍了许多新产品，因为我们是外行，领会不多。

吃中饭时，食堂的窗户都关上了。天气已经热了，为什么要关窗吃饭呢？我对他们说：“咱们吃包子，又有炒菜，又有汤，几碟几碗，叫人民看见会有意见的。并且一所的人，在长春市有很多亲友，认识溥仪，认识张焕相的人多得很，叫老百姓看到了这些大汉奸受

这么高的待遇，人民会怎么想？长春的人也有不少认识我的。关上窗户吃饭虽然热一点，倒也减少不少麻烦。这是政府苦心的安排。”我们有许多人只看到关上了窗户，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下午参观长春市区。南湖，我在长春期间没有到过，整天忙于督察事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从南湖到红旗街，距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一二里。解放前这里设了检查哨，由我派特务在这里当哨长，凡是出去的人一概不准再入市内。所以在卡哨外饿死了许多人，这也是我的一条罪恶。从红旗街转到同志街，途经一座一座楼房，日伪时期是大汉奸和日本战犯的住宅。国民党来了，就由国民党高级人员住用。现在到了人民手里，有的作了托儿所，有的作了幼儿园……汽车开得很慢，从同志街又到了南关，然后进城到了长春大马路……长春这些大街，哪一条大街没有留下督察处的罪恶？督察处的特务在我的指挥下，每天每时都在抓人，都在维持“治安”。当时，我不过点点头，或者哼一声，可是下边的人要大肆逮捕，造成被害人的经济破产或生命死亡。金科长要我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来想一想，对我震动很大。因为没有下车，没有遇到熟人，心里倒也安然。

6月11日，上午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给我们这队作解说的张同志是上海人，他在解说中最常用的话是：“在我们的国家，对待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都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在我们的国家，这是第一次生产汽车。”表现出新中国人民的自豪，我爱听他的解说。

我们参观了十多个主要车间，最后参观总装配车间。

我们看到9分钟一部解放牌大卡车从总装配车间开出去，真令人欢喜。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事情，将来产量还能多。有第一汽车制造厂，还要有第二、第三汽车制造厂呢。

去年我们是9个人参观，很方便。现在有260多人，一切都不方便了，有参观的，有等着的。我们这中队在大石头桥上休息，那边有几个执勤干部在说话：“哪一个是关梦龄？”

“就是那个矮个子，坐在石头上呢。”

“就是他呀！”

黄鹤听到告诉了我，我说：“我在长春的罪恶大，知道的人多。”

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些年轻的公安干部，可能是杨审讯员告诉他们我来长春了，所以要看看我是什么样，一看，一个矮子，“一般”的反革命分子。

托儿所里的孩子真是可爱，这些小宝宝是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接班人，在托儿所站着队欢迎我们，与我们握手。圆圆的笑脸，胖胖的小手，又健康又活泼，都像画里的孩子。一个小男孩与我握手，问我：“你们来几个人？”

我笑了笑，心想，我们来几个人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们也不知道，如果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们还能和我们握手吗？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哪里会想到这些，我为在孩子们面前的“伪装”面感到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这样。

这里的儿童得到良好的培养，正在幸福的成长。这使我想到郭树人解放前的家境，他是少将，国防部第二厅的少将部员。因为他不敢贪污，不会招摇，他一家大人和四五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吃饭是粗粮，小孩子穿的衣服像小乞丐一样。他本人也吃不到今天我们战犯吃的伙食，他的小孩子更赶不上今天托儿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是郭树人一个人，有许多少将都是这样。在国民党时有了兵，有了枪杆子，就能贪污，就能卖给养，就能吃空额，就能投机倒把，就能贪赃枉法，光杆司令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这并不是说光杆少将罪小，我是说一个光杆少将尽管给蒋介石卖命，可是家中生活过不很好。所以参观托儿所之后，郭树人说：“这里孩子生活比我解放前的生活都好。”大家笑了，细一想，确实如此。

各组派了一些人去参观儿童医院，其余的人在家休息。

参观回来，国民党长春团管区司令李树桂对我说：“我们坐在汽车上，路过七马路督察处旧址，我告诉他们，这就是关梦龄犯罪的特务机关。我也有许多感想，那时我常到那儿去找你……”

我心中很不安，解放已经八年了，督察处所犯的罪恶人民没有

忘，我自己也没有忘，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6月12日上午，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解放前这里住了解放军，距国民党军队的卡哨只有一二里之遥，相距这么近，两边喊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参观了各种内外景，特技表演，又到摄影棚参观，那里正在拍摄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吕剧演员郎咸芬饰李二嫂。为了一句话，一个动作，反复的修正，可见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很多劳动力，需要许多手续。什么工作也不容易呀。担任党的电影工作者，对人民的教育，对文娱生活的调剂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参观了兽医大学，看到了苏联的阿尔登种马，这些高大的马能挽车四吨。

晚上宣布参观结束，夜里离开长春。什么会也没开。又一想，也好，只要能认罪，不在于形式如何。

夜间出发比较好，我们在长春这几天接触了许多人，可能有不少人晓得了我们的身份。如果白天上火车，那不是我们参观长春，而是长春老百姓来观看我们了。

临睡前，看到门前有人在执勤。我们来长春四天，白天夜里要由公安人员来执勤，需要很大的劳动。这么二百多个反动派和大汉奸，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件那还了得。记得在1942年10月，蒋介石从兰州到西安，之前，由军统特务机关妥善地布置了警卫工作。因为1936年他在西安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再一次到西安特别戒备。特务机关与胡宗南再三考虑，小心安排，不许发生任何事件。当时我被派充警卫组第一组长，担任西安北大街的警卫工作。规定抓了嫌疑犯一律扣押，等蒋介石离开西安再行释放。蒋介石到了西安，住西安城南王曲。召集西北将领开了五天军事会议。有一夜，蒋介石自己带了一个随从，进入西安南门，到钟楼一带观看市容。在他要走的时候特务才发现，临时动员一些人到南门等处警卫。这一次在西安没有出事。

1945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宋美龄飞抵北平，抗战胜利亲自到华北来“安抚民心”。当时我在北京，担任前门大街到南苑机场

的警卫。蒋介石化名“高先生”，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门”，北京的特务立刻行动，在各街道警卫。当时戴笠也在北京，这次警卫做得也好，没有出事。

特务做警卫失败的是西安事变。当时戴笠没有在西安。事后戴笠吹牛，如果他在西安，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由那之后，军统特务给蒋介石做警卫，特别当心，不能使西安事变重演。

1946年6月，蒋介石从南京到沈阳，陈旭东负责警卫。蒋介石离沈阳之前召见陈旭东，对特务工作予以鼓励，并奖给这次做警卫的特务十万元东北流通券，参加警卫的人每人一个金戒指。陈旭东对这件事十分得意，引以为荣。在1956年于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谈到此事时，还颇有自豪的意味：“老头子到沈阳时，我派人做警卫……”

给蒋介石做警卫比较好做，给戴笠做警卫最困难。1942年春于西安，当时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马德皋给他做警卫，马德皋事后对我说：“咳，他乱跑，一会儿上汽车，一会儿下车徒步，东一拐西一拐，不一会追不上了，真伤脑筋。他走得快，有时他在前边走，忽然举手叫人，你就得到他的跟前，没有两下子就得挨骂。”这些特务勾当都已成了过去，今天人民公安机关的警卫怎么做的呢？

早上5点钟火车抵沈阳，又开动去鞍山。大家知道参观鞍钢，心里甚是高兴。到东北，不看看鞍钢，是不会领会“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之说的。我们参观了炼铁厂、薄板厂、无缝钢管厂、炼钢厂、9号高炉、轧钢厂等单位。厂子太多又太大，到哪儿都要坐汽车。因之只把主要的厂子看了一下，还有许多厂子没来得及看，这样看已经感到很疲劳了。

薄板就是做铁壶及炉筒子的原铁板，在旧中国是不能自造的，必须依赖日本进口。所以中国人管做铁壶的白铁板叫“洋铁”。现在，我们能自己制造了，就不叫“洋铁”叫“薄板”了。无缝钢管过去也是不能制造的，解放以后也能自造了。

1945年“九·三”之后，日本工程师回国时，对中国工人说，

鞍钢这个地方，你们只可以种高粱和豆子。意思是中国离开了日本工程师的技术，就不能进行钢铁生产。事实粉碎了反动的预言，现在鞍钢这块地方，不但没有种高粱，反而建了许多工厂。

我们又坐上了专车，天黑以后火车到达抚顺城车站，三省五市的大参观到此结束。

我在这次参观中认识到，像这样大规模参观不是中共中央，毛主席决定是办不到的，这次参观要许多部门协助，交通部、工业部、公安部、各地党政机关……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很大的方便，据说花了20多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真使我吃惊。我想起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精密加工车间，我看到门上贴着一个条子，“未经允许严禁入内”，但准许我们到里边参观，这是政府为了加速改造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之一。

参观之前，我们多数战犯有这么几个错误思想：

第一，我们抗过战，打过日本军队，并且还有人受伤。不错，我们承认反共，可我们也参加了抗战，日本投降，我们也有份功劳。这是“抗日有功”的思想；

第二，现在国民党被打垮了，共产党胜利了，我们被俘了或被捕了，作了战犯。共产党说什么都有理，这种思想是“胜王败寇”的思想；

第三，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打垮国民党是事实，但是要建设新中国，不一定能建设好，必须找苏联，共产党人不会建设；

第四，不服气思想。国民党被打垮，我们被俘，总觉得不甘心，特别是解放以后，看到一些干部和军人也并不是三头六臂，偏偏叫这些人打垮了，有点不服气；

第五，共产党只会宣传，实际情况也不知道，我们的脑子在解放前就存在“共产党只会宣传”的错误想法，到参观前还是没有变动；

第六，“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我们在参观前认为，东北的工业是日本建设的，共产党来了，修一修，补一补，就说是共产党建设的。

经过三省五市的大规模参观，这些思想被事实粉碎了。

并不是共产党打了胜仗说什么都有理，共产党在没有把国民党打垮的时候，老百姓就拥护他。因为有道理，给人民办好事。在国民党没有被打败的时候，老百姓拥护吗？不拥护。压榨人民，掠夺人民。在参观中，哈尔滨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及抚顺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接触的社员，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拥护，是异口同声称之为救命恩人。真理只有一个，不是胜败的问题，只要是真理必定会胜利。如果不是真理迟早也是失败，必被人民所唾弃，“胜王败寇”的说法被否定了。

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我们所参观的企业厂矿都有共产党人参加，都是共产党领导。亲眼一看，就改变了原来的说法。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一个师参加建设，放下武器，拿起工具。这样例子很多。

不服气是没有用的，这些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解放前哈尔滨是一个消费城市，抽大烟的、扎吗啡的、开妓馆的、设赌场的，到处皆是，社会风气败坏，流氓恶霸横行。这样的社会国民党绝对没有办法治好，但是共产党能治好。共产党的干部诚然不是三头六臂，但是这些干部诚诚恳恳为人民服务，不贪污、不舞弊，以人民利益为利益，这些事实摆在这里，不服气有什么用！

“共产党只会宣传”这是国民党的说法。我们这些战犯也中毒很深。就这次参观而言，参观前管理所的干部并没有对我们进行宣传，我们到各机关、企业参观，都叫你看实物，详细看。同时我认为，如果宣传对人民有利当然可以宣传。

东北的工业不是修一修，补一补日本遗留的厂矿，而是大力兴建工业设施。鞍钢解放后建设了许多新厂。长春的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的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电表仪器厂，长春玻璃仪器厂等，都是解放后新建的，不是修一修，补一补日本留下来的，更不是国民党建设的。

当然，并不是一次参观就能把我们全部思想都解决了，可是对

我们安心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回忆我的改造过程，在没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前的八年改造中，对共产党也是拥护的。为什么拥护呢？因为没杀我，宽大了我，我在良心上不能不说共产党好，不能不说毛主席对我的天高地厚的恩宽。究竟共产党怎么好呢？经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共产党好，不是仅仅不杀我的宽大政策好，而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能把人民引向富裕幸福的生活大道。这样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象到本质，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深一层的信任。

离开管理所 9 天，回到监号感到屋子尘土很厚，光线也十分暗。多日没翻报纸，打开报纸，我看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进攻。

①欧阳午：据 1960 年第二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欧阳午国民党第 60 军暂编 52 师少将副师长”。后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特赦通知书，按起义人员对待。据长春文史资料记载：“欧阳午同志，1948 年 10 月 17 日，在暂编 52 师师长李嵩阻碍起义被曾泽生扣押后，欧阳午同志毅然随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现任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

②孙所长：即孙明斋同志。

③金科长：即金源同志，后来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所长。

④3、4 所：抚顺战犯管理所下辖的“所”，为战犯的管理单位。1 至 7 所的序号为当年管理日本战犯所列。大批日本战犯离去后，只有 1、3、4、7 所关有战犯。1 所关押的是伪满洲国战犯，7 所关押的是日本战犯，3、4 所关押的是国民党战犯。最初国民党战犯是以地区分所、室，后来因生产分工，身体状况进行若干次调整。

⑤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但其组织、人事、业务均归公安部门领导。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是管理战犯的特殊需要，以示与管教普通罪犯之不同。

⑥金本水火土：长春督察处刑讯犯人除一般的打骂、体罚外，专门设有金、木、水、火、土五类刑罚。金刑：以金属物、金属器械伤人，如，铁棍、铁丝、铁条、钢丝鞭，过电也属金刑之列；木刑：刑具以木器为主，例如坐“飞机”、压杠子、打棒子等；水刑：对受害人灌辣椒水和凉水；火刑：用点燃的蜡烛去烧被害人的脚心；土刑：让人跪在硬地或砖石上，两手高举一本杠，长时间不许动。